

The Economic Logic in Culture Reforms

文化改革的 经济学逻辑

魏建 辛纳 赵阳◎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和文化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2AZD023)的最终成果

The Economic Logic in Culture Reforms

文化改革的 经济学逻辑



魏建 辛纳 赵阳◎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改革的经济学逻辑/魏建，辛纳，赵阳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 - 7 - 5141 - 8894 - 3

I. ①文… II. ①魏…②辛…③赵… III. ①文化事业 -
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②文化经济学 - 研究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934 号

责任编辑：于海汛 刘战兵

责任校对：郑淑艳

责任印制：李 鹏

文化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魏 建 辛 纳 赵 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7 印张 280000 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894 - 3 定价：5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esp.com.cn)

序 言

进入文化与经济交叉研究领域，对我来说，纯属偶然。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围绕《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重大课题招标，其中有一项为《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研究》。起初我并没有申报的打算，因为我觉得自己对文化基本上没有研究，尽管对于改革已经进行过不少研究。但在同事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进行了申报，并且在申报书中着重强调了我们在改革研究方面的优势。幸运的是，我通过了第一轮的通讯评审，进入到第二轮的专家面审。在专家面审时，我们对于文化并没有深刻理解的缺陷暴露得较为充分。面审完之后，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被通知给予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资助。事后琢磨，被资助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交叉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因为当时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文化改革的学者确实还不多。就此，我踏上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理解文化及其改革的学术道路。

然而，现在回头看来，进入文化与经济的交叉研究领域也有着相对的必然性。我的核心研究领域是法经济学，主要是将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于对法律问题的分析。但法经济学分为两个大的领域：微观法经济学和宏观法经济学。微观法经济学主要是集中分析各个部门法领域的经济学结构，分析具体法律规则产生的行为均衡是否是有效率的。宏观法经济学则主要研究法律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讨论什么样的法律能够起到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刚刚进入法经济学领域时，主要研究集中在法经济学微观领域，尤其是基础理论领域。后来逐渐转向法经济学的宏观领域，并为经济学和法学专业的博士生开了“法律与发展”这个专题课程。在法律与发展关系的分析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从经

济增长的角度，我也一直关注文化的力量和影响。

但是真正进入文化领域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既充满魅力又让人无奈的领域。说它充满魅力，不仅是因为文化本身丰富多彩，而且因为在文化领域还有着众多的经济学没有充分解释甚至根本没有解释的领域；说它让人无奈，是因为文化及其表现太难以把握，不仅概念上难以清晰界定，而且具体的表现形式和领域也难以界定，衡量指标更是难以确定。文化问题太复杂，以至于经济学无从入手。

面对文化迷雾，从课题立项到研究报告完成，我们先后在山东、陕西等地进行了调研，参加了众多文化改革等领域的研讨会。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框架性的认识，对我国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内在规律也有了相当的把握。其中，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研究原则就是：不论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多么复杂和多样，其中相关主体的行为表现始终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和切入点。经济分析框架下，各方主体最终的行为表现及其均衡的产生，不仅受经济分析常常讨论的成本、收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成本、收益的形成和分布状态深深决定于文化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文化的供给、消费和管理有着完全不同于普遍商品的规律。准确地把握这些规律，并将这些规律运用于改革之中，才能保障改革的成功。

我们发现文化供给领域的成本滞后规律、文化人力资本的特殊性、文化消费的累积性、国有文化组织的体制是我国文化单位改革面临的四个挑战。要成功应对这四个挑战，仅仅依靠院团的转企改制这条将院团推向市场的道路是难以实现的。成功的文化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构建更要建立在对文化发展规律有着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文化的外部性构成了进行管理的理论基础，面对文化成长的不确定性，要凝聚形成核心文化价值也要求进行管理，但是我国摇摆的文化管理目标、分割的文化管理体制、不成熟的文化执法等问题都制约着我国文化管理改革的深入。对此，我们的研究给出了一些回答。

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的供给、消费和管理进行分析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回顾整个研究过程，在享受探索发现、理清思路的快乐的同时，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文化迷雾”威力带来的迷茫和痛苦。显然我们还是文化领域的新进入者，对于文化特殊性的把握还远远不够，得出的一些结论还不够深入、稳健，启发性还不够透彻高远。因此，我们期待得到更多的批评，期待更多的经济学、管理学学者关注文化领域，相互探讨，以把

研究推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

我们也坚信，对文化从更多的角度展开研究将成为趋势，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终极因素，是一个社会最核心的构成。对于有着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来说，当前也有着通过文化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冲动，更有着凝聚全社会文化价值的强烈需求。因此，我们的同行者会越来越多。

本书是我和我的两位博士辛纳、赵阳倾力合作完成的。我负责全书的整体框架与理论定向，辛纳主要负责国有文化单位改革部分，赵阳主要负责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部分。这些成果同时也构成了他们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并且有些章节也已经独立成文进行了发表。

在研究成果即将出版之时，要感谢那些在我们初入文化研究领域时给予我们诸多支持的学者们和实务界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和肯定，我们的研究才能不断进步。特别是在与武汉大学的傅才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范周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魏鹏举教授、山东大学的潘爱玲教授等先进者学习、请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得到了拓展，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还要感谢参加 2015 年在山东大学举办的“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和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研讨会的学者们，他们有针对性的发言，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很多收获。还要感谢山东演艺集团的林凡军先生、西安演艺集团的寇雅玲女士等文化改革一线的有识之士们，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改革实践材料。

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编辑工作，他们的工作使本书更加精彩。

一个课题的研究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多彩的文化世界，与诸多同行者的热烈交流，也使我们逐渐成为“有文化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也是最大的幸福。

是为序。

魏 建

2018 年元月于山东大学知新楼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改革的挑战与破局：改革规律的再探索 / 1

- 一、文化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大需求 / 1
- 二、本书主要架构 / 12

第二章 文化供给中的外部性和生产力滞后特征 / 15

- 一、文化产品的外部性特征 / 15
- 二、文化产品的“鲍莫尔成本病”特征 / 19
- 三、生产力滞后的负效应和“鲍莫尔成本病”问题的解决方案 / 29

第三章 文化成长中的不确定性 / 33

- 一、不确定性理论及其解释 / 33
- 二、文化成长不确定性的形成 / 35
- 三、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 39

第四章 文化需求形成的影响因素和理性上瘾特征 / 44

- 一、文化艺术的消费特征 / 44
- 二、文化消费的一般影响因素——横向需求分析 / 46
- 三、表演艺术消费形成的特殊性——纵向需求形成 / 48

第五章 文化体制改革进展的理论透视和研究述评 / 59

-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既有成果 / 59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亟待深化之处 / 71
三、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述评 / 83

第六章 4C 理论视角下文化单位改革的现实困境 / 98

一、文化组织发展难题和应对策略的既有研究 / 98
二、转企政策和转企现状 / 106
三、基于 4C 理论检验文化单位改革困境的影响因素 / 110
四、初步的发展建议 / 119

第七章 文化创新能力、激励结构与文化单位改革 / 121

一、文化创意生产的基本特征：文献综述 / 121
二、文化创意能力和改革中对人力资本的忽视 / 124
三、人力资本激励——对一些既有制度安排的分析 / 126
四、组织剩余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 131
五、文化组织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 138

第八章 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与深化文化单位改革 / 140

一、专用性人力资本及其积累——效用分析 / 142
二、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基于委托代理和市场需求的分析 / 145
三、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实践 / 150
四、以非营利组织为方向，深化文化单位改革 / 154

第九章 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定位的经济学逻辑 / 166

一、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定位之一：激励社会文化自由创作 / 167
二、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定位之二：引导文化消费传播 / 179

第十章 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展路径 / 190

一、以社会效益为改革核心，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机制 / 192
二、以“宏观管理”和“依法管理”为突破，强化文化管理 职能 / 197

三、强化政策扶持与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建设，构建新型文化投融资管理体制 / 200
四、实施差异化管理，激活文化微观运行机制 / 213
五、完善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形成强力支撑 / 223
参考文献 / 237

第一章 文化改革的挑战与破局： 改革规律的再探索

一、文化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大需求

（一）时代需求与面临的挑战

1. 文化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大需求。文化发展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从国家的角度讲，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发展文化产业和事业，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解决转轨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提高精神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从产业的角度讲，文化的发展具有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从消费的角度讲，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升幸福指数。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高峰期，发展文化日益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改善和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需求。

文化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当今文化和经济相互交融，使得文化日渐成为除资本、技术外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正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西方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就是在经济衰退、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中完成的。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发生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时发生的是从传统的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因此非物质形态的商品尤其是文化商品在消费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倒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组织创新与组织重构的推动下，投资越来越多地

流向服务产业，文化产业随之兴起。美国更是通过集团化和纵向一体化率先形成了一批文化产业巨头，如新闻集团、迪士尼公司、好莱坞和百老汇等，成为文化产业大国。“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全球各地，文化产业已经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文化领域内长期存在的公共所有权及规制的传统已经被摒弃，重要决策的制定日益在国际层面上进行。”^①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的快速崛起意味着通过自身不断努力，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中国通过渐进式转轨改革稳步崛起，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发展，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播、扩散，都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源自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立的、开创性的探索，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聚有助于形成未来发展的持续动力，消除和克服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错误认识。与此同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无疑是中国正确选择改革开放道路的结果。

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已经成为共识，如何保持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新时期面临的重大议题。文化发展不仅是改变中国发展内核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文化发展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进行全面国际竞争的需要。而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更多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转轨时期人民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较大偏离，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逐渐成为制约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文化有助于缩小社会各个方面的差距，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保持未来中国的稳健、高效发展。

文化入侵和文化保护引发了文化发展的危机意识。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文化贸易产生的被称为“新殖民化现象”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引起了各国对本国文化的保护、扶持以及思考。其中法国是典型的实施文化保护的国家，认为“精神产品的创作不同于一般商品，文化的构成不同于纯粹

^① 大卫·赫斯蒙德夫. 文化产业 [M]. 张菲娜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 2.

的商业，一个放弃了描绘自己方式的社会将很快坠入受奴役的困境之中”，^①这就是“文化例外”原则。林肯·柯尔斯滕更是将文化和艺术描述为标志并超越了个人时代的唯一值得纪念的遗产。因此，文化领域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经济领域，表演团体与文化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剧团通过向观众提供纯粹的娱乐活动而获得利润。不同国家更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考虑对文化形式和内容进行管制、引导与资助，“文化例外”原则和构建文化软实力的需求都体现了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 文化发展面临重大挑战。我国文化发展水平整体滞后，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并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二是文艺演出、影视出版等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同时，多种问题共同交织，影响文化产品供给及其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文化产品的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自发产品供给不足；“鲍莫尔成本病”问题广泛存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文化生产创作过程中，导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文化消费和供给过程面临双重财务困境；文化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不确定性问题，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制约着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得我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不是文化产业大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严重不足，当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文化领域仍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1) 强有力的文化生产经营组织是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和主力军。国有文化单位是中国文化生产、传播的主力军，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和资源。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呈现出活力下降、机制不活、基层崩溃等诸多问题，在文化供给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脱胎于计划经济、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的文化产业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整体效率不高、产业规模不大、发展环境不利等问题制约着其发展壮大。同时，不管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其自身发展都具有双重特殊性：一是文化生产经营组织自身的特殊性；二是体制机制约束导致的特殊性。这些特性使其在改革过程中面临众多挑战，需要通过强力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激发其活力，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① 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僵局中，法国前总统密特朗（1981~1995年执政）所言。

(2) 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不通畅、效率低，没有起到和发挥促进作用。我国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体制，国有文化单位不仅是文化产品的供给者，也是管理者，自我管理是核心特征。随着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文化管理体制显著不适应于发展的需要，不仅管理职能分散、体制不健全，而且管理手段单一、行政色彩突出，进而导致文化事业和产业界限不清晰，管理效率低下。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文化发展职能没有被很好地履行，文化产业、事业的界限还在进一步探索中，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管理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和落实。文化法律建设滞后，对于舆论导向的把握缺乏法律依据，引导能力不足。要支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

3. 改革的努力与深化改革的必要。为构建良好的文化生态，针对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外部性”“鲍莫尔成本病”以及“不确定性”三大突出问题，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在社会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下，我国以改革促发展，大力推进文化单位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加快其市场化进程。文化单位的改革总体分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些特殊单位的改革，改革路径依类别不同而不同。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1996 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从 2003 年起，文艺院团开始开展试点工作，全面推进以“事转企”为核心的体制改革，以重塑国有表演艺术团体的市场微观主体地位，发挥其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中坚力量。2009 年 8 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中宣部、文化部出台《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文化“深水区”改革的全面展开。2011 年 3 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全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速。2011 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进一步将文化建设和发展提到更高的层次，把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和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全面落实各项文化建设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支持。2014 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内在要求，是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催生新兴业态、带动就业、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完善文化“三体系”，即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改变了“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以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思路，同时，由过去的加快“新兴媒体建设”发展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并首次提出“网络文化建设”等内容。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加大文化改革推进力度，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铸造富有活力的文化生产经营组织，加速推动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格局。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有关文化的重点工作表述中提出：“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开拓发展更大空间——支持发展养老、健康、家政、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服务消费”“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引导公共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繁荣文化市场，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和文化名家工程，为全体人民提供昂扬向上、多姿多彩、怡养情怀的精神食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各项举措的推行，无不表明文化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得到认可，文化体制改革正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其中，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特别是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中之重，也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文艺院团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艺术传承、价值观培育和正能量传播等功能。而原有事业制则逐渐暴露出发展弊端，阻碍了其上述功能的发挥。该体制机制下，许多国有院团发展动力不足，甚至名存实亡。因此，大部分国有文艺院团被划为经营性文化单位，实行“转企改制”，以改革促

发展。然而，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尽管在激发院团危机意识、引导市场化发展理念、改善内部薪酬体系等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同时也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人才断档流失和人才培养难的问题。总体来看，受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困难重重，改革成果是局部性的且十分有限，院团的自我生存能力不强，^① 市场化道路举步维艰。据调研，目前我国国有文艺院团的人员工资、剧目创作和演出资金来源仍以政府资助为主，剧目内容上也以主抓政府和国有企业诉求为主，真正的市场化演出极少，除少数院团挂牌成立有限公司外，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受政策、前途不明等因素影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外促力不足，多地改革出现搁置现象。

因此，如何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尤其是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并进一步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成为当下重要的研究议题。中国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依然任重道远。我们结合国内外文化发展历程和现状，以文化供给、需求和发展规律为研究依托，以“外部性”“鲍莫尔成本病”“不确定性”和“理性上瘾”等突出特征为切入点，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探讨我国艺术组织困境的成因和文化管理的内在规律，从而为我国文化单位的市场化发展和相应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方向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实现更有效率的文化供给体系的重构和文化的长期繁荣发展。

（二）文化改革规律的再把握

1.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念提供了基本的逻辑出发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始终站在现实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从实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各种文化现象。各种文化的形式和形态，只能通过实际地改变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现实社会关系，才能得到最终的改变。因此，理解我国当前的文化现象和为文化发展指明方向，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践，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背景下把握文化发展问题。

^① 本文所指财务困境（financial dilemma 或 economic dilemma），特指表演艺术组织面临的不好的经济处境，与下文度量指标“收入差距”相对应。“财务困境”是一个比鲍莫尔的“成本病”（cost disease）更大、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它不仅包含并扩大了传统成本方面的因素，还包括需求角度的影响因素。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把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看成文化发展的基础，不等于说文化发展是完全被动、完全静态的；相反，文化具有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①这就表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互为对象、彼此推动的，文化在其中扮演着十分活跃和重要的角色。文化是一种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中的力量，对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出现非均衡局面的今天，凝练社会核心价值、大力繁荣文化，就能够起到凝神聚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

2.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文化改革的内在逻辑。

(1) 文化经济学的发展。随着经济研究的扩展和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日渐受到更多的关注。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分支，文化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因此，认识并总结现有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分支和进展有利于把握研究方向，发现文化研究领域的共性和特殊性。

随着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国外学者从 21 世纪中后期开始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现在文化经济学已然发展成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受到认可和关注的专业分支。陶斯在 1997 年就对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做了详细的阐述，认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论题包括需求、供给、行业组织、艺术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公司行为和公共补贴。^② 我国对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后逐渐得到重视。

研究初期，学者对何为文化经济学进行了探讨，多数学者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如方加良（1991）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研究文化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严行方（1992）^③认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关于文化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王家新，傅才武. 艺术文化经济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7.

③ 严行方. 文化经济学 [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域经济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文化学和经济学相互延伸交叉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1993年，程恩富撰写的《文化经济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试图全面系统地探讨‘大文化’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专著”（尹伯成，1994）^①。该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文化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容涉及文化与经济的共生互动关系、文化资源配置、文化供需、文化投资、文化劳动以及文化发展战略等。胡惠林（2004^②，2009^③）对文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化产业的讨论。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以及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确立了文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政策、安全做了较为宏观的论述，本质上属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范畴。

也有学者，如安应民、高新才（1995）^④认为，文化经济学不是研究文化领域或文化事业本身发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从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活动，探讨与研究不同文化层面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所蕴含的内在规律，从而阐释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发生、发展及其变革的规律性。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历史学。王天玺（2012）^⑤指出，与经济、政治并列的狭义文化，应当包含意识形态、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认为文化经济学应当力求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约化，用人类文化的结晶——阴阳对立统一的方法来阐明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强调文化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属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范畴。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上日益靠近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在范围上出现了细分，并深入到文化产品的微观领域。如李永刚（2013）^⑥指出，文化是一种影响经济行为人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国家和区域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主观精神变量。文化经济学把人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主观精神禀赋纳入经济分析，与行为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心理过程与结构纳入经济分析一样，都

^① 尹伯成. 评介程恩富教授主编的《文化经济学》[J]. 经济学动态, 1994.

^② 胡惠林. 关于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两点思考 [J]. 学术月刊, 2004 (6): 60-64.

^③ 胡惠林.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 [J]. 东岳论丛, 2009 (2).

^④ 安应民, 高新才. 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

^⑤ 王天玺. 何为“文化经济学” [J]. 当代贵州, 2012 (2).

^⑥ 李永刚. 文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J]. 学术月刊, 2013.